

孔明思想实验

民主,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决策机制,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确保我们能做出得到最多数人支持的结果,但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其原因,不仅因为“少数”有时可能是对的,还在于“多数”是一个可以置疑的概念。

“多数”之所以可置疑,在于其构成混杂,且易被利益所裹挟。多数,作为一个群体,其中,有好人,也有不好之人,更多的则是介于好坏之间的“众人”。这一群体,缺乏相同的价值观念,常会因特定的利益而分化组合。

对于“多数”,孔子是持怀疑态度的。《论语》中记载:“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 28》)意思是:一个人,大家都说不好,定要细察;大家都说好,也要细察。

孔子对弟子贡解释了其中缘由:“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24》)

在孔子看来,乡人里,有善者,也有不善者。若“皆好之”,需要细察的是:不善者为什么也说他好?“皆恶之”时,需要细察的是:善者为什么也说他不好?孔子认为:一个贤者,不应该是大家都称赞的“乡愿”(老好人),而应是“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的君子。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所有人都支持的人和事,一定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不善者”也支持);

2)多数人支持的人和事,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善者”可能是反对的“少数”);

孔子对于“多数”所保持的清醒和警惕,并非没有道理,这为后来社会学中“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 定理)所揭示。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在其《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以数理逻辑的方式证明:如果众多社会成员具有不同偏好时,面对多种备选方案,

不仅仅是“多数”

钱 宁

仅依靠简单“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原则,不可能得出最佳选择。

如果沿着孔子的思路继续探寻下去,我们发现:一个社会想做出最佳选择,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1)“众好之”——得到“多数”的支持;

2)“善者好之”——得到“多数”中“善者”的支持;

以此推断,在民主决策程序中,只有同时得到“多数”和其中的“善者”的支持,才能确保做出最好的选择,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找到“善者”呢?

对此,中国传统政治的解决方案是“贤能政治”——“选贤与能”,先是举荐制,后有科

举制。前者常因“举贤不避亲”而搞成了裙带关系;后者多些公平,不过,科举选拔出的多是“能者”,未必是“贤者”。“贤者”更接近于“善者”,考试是考不出来的。

其实,“选贤”——在民众中找出“善者”,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挑战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学上,“善者”,无法精准定义,具体甄别起来,定有争议;其次,“善者”并非一成不变,人总是在变化中,20岁的“善者”,50岁时可能变成“不善者”;第三,“善者”的荐选程序,易被人操控,荐来选去,会成“亲友团”。

“选贤”之事,我想,计算机做起来一定会比人做得好。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数字化评估系统,计算机程序不难识别出人群中的“善者”——不是一个完美的“善人”,而是一个最接近“善人”概念的群体。这样,被动筛选取代了人为推举,动态标准取代了静态定性,整体识别取代了个体甄别,如此,既能避免人性弱点,又能保证程序公正。

就民主决策程序而言,重要的是“善者”的判断,而不是“善者”的推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想法,而并不一定需要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因此,计算机程序,通过选票统计和数据分析,既能准确做出一个“众好之”的选择,也能判断出这一选择是否“善者好之”。

当然,人类社会的问题,是利益问题,不是数学问题,不过,数字化决策,显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条道路。

离赤道近在咫尺的国家

邵天骏

来到新加坡,感觉她与我国江南一带的亚热带气候迥然不同。她地处赤道附近,阳光十分充足,且常年高温多雨,有着“世界花园城市”的美称。许多地方都有绿荫的遮蔽,不时有雨水的滋润,花草也因此变得格外茂盛,并不感觉十分闷热。

在靠近赤道的国家中,有几座著名的城市,像基多、利伯维尔、内罗毕和新加坡等,尤以新加坡最为遐迩闻名。新加坡尽管地处赤道附近,在地理上仍是北半球国家。不过,由于距离赤道太近,只一眨眼工夫就可到达南半球,可谓是赤道的瞭望者和守望者。

新加坡距离赤道路途之短,已不足150千米。在她的西北面是马来西亚,有海堤与马来半岛相连。扼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这里欣赏马六甲海峡,在绿树掩映的山坡下,远处碧波荡漾的海面巨轮点点。而新加坡繁荣的航运业和货物中转港口,使她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大港。

赤道的风情究竟是怎么样的,没有到过这里的人很难说上个大略。于是,许多游客纷纷来到这里一睹它的芳容,满足一下心中的窥望。如今,处在这条线上的不少国家大多已是旅游胜地,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肯尼亚和厄瓜多尔等,整个串连成了一条赤道两边的旅游线路,让美妙的赤道风景永远驻足在游客心间,带来持久的回忆。

对于赤道的印象,妻子应该是我早了好多年。上世纪90年代,妻子到过非洲的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并在科特迪瓦小住过一段时间,后者已经离赤道相当近了。至今妻子依然清晰地记得游玩在几内亚海岸的那段愉快经历,海水是那么湛蓝,天空是那么辽阔,树木是那么茂盛,疑是人间的仙境。许多人或与海水嬉戏,或踏着帆船穿浪,自是轻松惬意,曼妙无比。

行走在离赤道最近的地方,我慢慢地体会到了其中的意境。赤道的风情,除了各种竞相盛开的花卉以外,还能从高大的树木、房屋的布局中看出端倪。此外,这里少台风,也与地处赤道附近有着某种关联。通常台风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外界力量,由于新加坡的纬度很低,地转偏向力明显不足,再加上其他各种因素叠加,于是台风也就对此敬而远之,对新加坡的破坏作用几可忽略不计。

热带有热带的景观,赤道有赤道的风情。许多当地的人文景观、风土人情和自然美韵,都是不曾见到的。只要你用心细细捕捉,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答案。尤其是赤道及其附近的迷人梦幻,不少都是有源可循。而赤道的缤纷元素,总会散落一地。

靠近赤道的新加坡,既有眼花缭乱的七彩世界,又有恬淡秀美的平静情怀,它们都是构成新加坡难忘风情的长长纽带。

老侦察员的儿童团故事

姚鹏飞

他是一位老侦察员,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就从战场进入了这座城市,在公安局工作;他又是一位老侦察干部,在国家安全局组建时,又从公安局副局长职位上调到隐蔽战线工作,仍任副局长。他一生参与、指挥侦破过数十宗间谍案件,但是公开的报道中从无他的真实姓名。如今他已长眠在龙华烈士陵园内,他就是秘密战争中的“老侦察”,人称“老板”的唐连勋。这里要讲的不是他破案的传奇事迹,而是其任儿童团长时与日本鬼子周旋的故事。

唐连勋于1928年出生在山东省胶东半岛崂山脚下下一个贫农家庭,童年是在抗日烽火年代度过。胶东半岛和崂山脚下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山东境内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大哥唐连珠在“七七”抗战爆发后就参加了八路军领导的崂山地区的农民抗日武装暴动,兄长和众乡亲的抗战事实,使他懂得侵略者的残酷和战胜日寇的决心。

1942年,14岁的唐连勋进了山马程中心小学。该学校有八路军背景,是八路军常聚集活动的场所,校长邹子明是中共地下党员。唐连勋当时担任学校的秘密儿童团团长,他们主要活动是向同学讲述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战斗故事和战斗英雄的事迹,负责和教唱抗日歌曲,激发同学们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其次,如八路军的武工队或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到学校或向村民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时,他们就组织儿童团员在村外站岗放哨,盘查可疑的过往行人和监视相距学校约八华里汪岭镇据点内的日本鬼子的活动动态,一旦发现他们部队外出的迹象,立即发出信号,通知工作队转移。

次年年初秋的一天,区工作队正在学校向同学宣传抗日和教唱抗日歌曲时,唐连勋和邱洪源等4名儿童团员,在村北面的山顶上站岗,突然发现从汪岭镇鬼子据点方向过来50多个日本鬼子,向文登城方向出发。他们立即在一棵松树上放出一个风



北京四合院 (速写) 宋刚

的住处。进门后只见陈躺在炕上,睁着眼睛不说话,叫他也沒有任何反应。唐急着去找房东,谁知刚走到街上就与进村的日本鬼子相遇了。鬼子让他带路去找村长。唐一边佯装为鬼子带路,一边寻找机会脱身。路边一位村民对鬼子说见过村长,唐借故脱身,飞奔返回陈书记的住处。这时,房东(地下党妇救会长)已回来。唐说明来意。她表示理解,并说老陈的羊癫疯病发了,只要摇动一会就会好的。他们俩一人拉着老陈的一只胳膊,用力地摇动,将老陈惊醒。唐把信交给他,并告诉鬼子进村了。老陈让唐转告邹子明一切放心。唐返回学校向邹老师汇报了全过程。他高兴地说:“你能冷静应付,随机应变,做得很好”,并要求他马上安排同学到村东头放哨,时刻观察鬼子的动向。随后听说,陈书记接到那封密信后指挥埋伏在山上的游击队打了一阵子冷枪即撤离,日本鬼子惊恐万分,立即撤出了县城。

1944年崂山地区已解放,中共建立了地方民主政府。唐连勋也就在这个历史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夜晚,点着油灯,党支部为唐连勋举行

共话平生

陈 迅

丰子恺画过多幅共话平生图,两三人坐在一起,有酒有茶,或于节假日,或于夜晚,款识云:“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诗是嘉佑五年王安石写给他的大妹妹王淑文的。

那年王安石四十岁,兄妹相会,共话平生,此情此景,可想而知。漫漫人生路,几回驿站歇息,几回共话平生。

转眼,党龄已经41年了。那是1975年春,大兴安岭积雪开始融化,这个人类高寒禁区迎来了建设者修路架桥的黄金季节。要在百多天的时间里完成上级下达的筑路任务,困难重重,压力巨大。刚进入五月,呼中区筑路二处就召开了干部职工筑路大会战誓师大会。所有干部、工人背起铺盖行李会战第一线,在浩瀚的原始森林深处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筑路生产大会战。

在新搭建的帐篷里,一只由油桶改装的大铁炉子里熊熊燃烧着样子,驱赶着帐篷里的寒气,在用小杆铺成的“床”上堆着各人的铺盖行李,潮湿的地上,几个高低不一的木墩子,就是我们的桌子与凳子,没有电灯。我们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面窝窝头,加上没有油水的干白菜与土豆,条件简陋,生活艰苦。

当时我是筑路二处政工组的宣传干事,我的任务是编印《筑路战报》。《筑路战报》发到筑路二处所属各连队和各部门,同时发往上级宣传部门和《大兴安岭报》,广播电台。报纸的采访,编辑,刻印,发

行仅我一人。《筑路战报》主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领导指示,报道和交流会战情况,报道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以此鼓舞人,激励人,振奋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我带着全部家当——钢板、铁笔、蜡纸、油印机和几大叠8K白纸,加入了会战队伍。

我因陋就简,觅来了两块铺板,既当床又当工作台。晚上,把铺盖往上一翻,点上蜡烛就可以写稿刻蜡纸。在帐篷的一头,用铁锹铲平了一小块地,铺上麻袋,放上油印机就是“印刷所”了。我白天跑工地,每天十几里路来回穿梭在几个工地采访,晚上编稿刻蜡纸,两到三天出一期报,压力大时间紧,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最艰苦的是刻蜡纸,昏暗的烛光,呛鼻刺眼的烟雾,眼睛被烟熏得又红又肿,几乎睁不开,我也不在乎,那时干劲十足,几乎是忘我地工作。不知不觉已出了近二十来期《筑路战报》。

会战进入关键阶段,上级要求必须赶在雨季前完成全部路基的施工任务。人们抢晴天,战雨天,白天黑夜连轴转,分秒必争。艰苦的生活,高强度的劳动,把人们折磨得面黄肌瘦,体力不支,极度的疲劳和困乏袭击着每一个人。艰苦之中见精神,这段时间,涌现出了一批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永挑重担,一心扑在生产上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我写的不少报道被《大兴安岭报》刊登,在电台里播放。身边人身边事,他们的模范行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振奋了人们的精神,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这一年,筑路二处提前完成了筑路任务。这一年,《筑路战报》出了五十多期,创了历史纪录。这一年报道过的先进人物都被评为筑路二处的劳动模范,好几位成了呼中区的劳动模范。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韩奶奶写出数万字,记录她和秦鸿钧烈士的经历,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